

# 一個被遺忘的學者 ——常燕生

● 智效民

今年12月8日，是著名學者常燕生(1898-1947)誕生一百周年。正好幾個月前我去北京開會，一位朋友慷慨借給我一套台灣出版的《常燕生先生遺集》。在此以前，我曾經幾次看到常燕生這個名字，但都是一帶而過；只有這一次，才使我對這位鮮為人知的學者及其學術思想有了進一步的了解。於是，當我在深訝於中國還有過這樣一位思想家的同時，也希望與大家一道分享這份被遺棄的思想資源。否則的話，我真不知道歷史的輪迴甚麼時候就會降臨……

最初看到常燕生的名字，大概是在魯迅先生的著作中。當時因為對此人不甚了了，也就沒有留意。後來在安徽出版社出版的《獨秀文存》又見到這個名字，才引起我的注意。這本書收錄了陳獨秀與常燕生的四次通信，其數量之多，只有錢玄同能夠相比(也是四次)，可見陳獨秀對他的意見是多麼重視。這些信討論了古文、孔教和家庭等問題，現在看來，常當年提出來的許多問題都是很深刻、很有遠見

的。比如他在當時就清醒地指出，法國大革命之後所造成的人人自危、朝不保夕的恐怖狀況，是「專制之亂，而非共和之亂也」。他還說，應該「提倡建設之言論，不提倡破壞之言論」。這對於那些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就不擇手段的破壞主義者們，既是深刻的揭露，又是有力的批駁。

也許讀者還沒有注意到，這時候的常燕生才剛滿十八周歲。以如此小的年紀，與大名鼎鼎的《新青年》主編討論如此重大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，在今天看來真有些不可思議。因此我想，倘若這不是一個天才，就是如今的教育出了甚麼問題。

再次看到常燕生的名字，是在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出的《胡適作品集》中。該作品集的第9冊是《我們的政治主張》，即《胡適文存》第二集第三卷。所謂「我們的政治主張」，是指胡適、蔡元培等十六位著名學者所提出來的「好政府主義」。這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聯名發表的第一個政治宣言，其意義和影響至今仍需要進一步研

究。文章發表後，常燕生致信胡適，希望他能夠全力以赴地評論政治，發表政見。胡適根據他提出來的一些問題，也公開作了答覆，並把這些書信一起編入這本書中。

又一次看到常燕生的名字，是在前不久撰寫〈漫話張奚若〉的時候。為完成這篇文章，我仔細閱讀了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《晨報副刊》第10分冊（1925年10月至12月），其中有徐志摩擔任主編時組織的那場「關於蘇俄問題」的大討論。討論是由北京大學教授陳啟修在《晨報副刊》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引起的，參加討論的有梁啟超、張奚若、徐志摩、張慰慈、陳翰笙、余上源、錢端升等一大批學界名流，當時常燕生也寫了一篇文章，題為〈我反對蘇俄的一個最大的理由〉，刊登在1925年11月16日的《晨報副刊》上。瀏覽這篇文章，我以為常的理由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：一，蘇俄所推行的是一種偽共產的官僚主義，這種主義與專制體制結合起來，將會產生莫大的禍害；二，蘇俄政治不是出於全體國民的公意，而是少數人專斷；三，蘇俄是假共產之名，行專制之實，這與中世紀教皇的作法如出一轍；四，最可怕的是，蘇俄引導青年迷信武力萬能，實行排除異己的黨化政治。事後，北新書局曾經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，取名為《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》。可惜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再加上眾所周知的原因，後人對這次討論的內容已經非常陌生甚至是一無所知了。幸好蘇聯已經解體，這個話題已經不該再有甚麼禁忌，所以我覺得，倘若有出版社願意再版這個討論集的話，將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。

儘管讀書研究中多次與常燕生相遇，但我對他還是知之甚少，我甚至懷疑，常之所以在我的視野中或隱或

現，可能是因為他在學術道路上沒有堅持到底之故。正在這時，我有幸閱讀了《常燕生先生遺集》，這才使我厚誣先哲的猜測得以糾正。

常燕生學名常乃德，山西榆次人，因為他出生於北京，故以燕生為表字。有清一代，榆次常家是山西商人中的一支勁旅。據《山西外貿志（初稿）》記載：「在恰克圖從事對俄貿易的眾多山西商號中，經營歷史最長規模最大者，首推榆次車輞鎮常家。……尤其到晚清，在恰克圖十數個大的山西商號中，常氏一門竟獨佔其四，堪稱清代本省的巨商和外貿世家。」在經歷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興旺發達之後，常家經營的事業從庚子事變開始衰落，到辛亥革命、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以後，便一蹶不振了。也就是說，常乃德剛剛來到這個世界，就遇上了盛極而衰的家族劇變。

儘管如此，常燕生從小還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。這一方面與他的父親在外地做官有關，另一方面也得益於常氏家族素有尊師重教的習慣。據說，「車輞常氏從清康熙年間始設私塾到1938年日軍入侵榆次常氏篤初小學被迫停學，辦學育人，綿延二百餘年，可謂三晉近代史上辦學時間最長的家族」。正因為如此，這個家族才培養出常贊春、常燕生、常風等一大批文化名人。

常燕生五六歲的時候，其父宦游河南，不久他開始啟蒙識字，到十四歲已經在經史之學方面奠定了很好的基礎。辛亥革命後，他隨父親回到家鄉，就讀於篤初學校，不久，他進入省城一所中學求學，曾在一次全省會考中高居榜首，被譽為「山西狀元」。1916年他負笈北京，剛剛進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預科，就投入了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。後來，他還在《時事新

報)和《東方雜誌》等許多報刊上發表文章，討論文化教育等問題，從而進一步引起了人們的注意。

1920年夏，常燕生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部畢業後，以教育為自己的終生志業，先後在北京高師附中、中國公學附中和燕京大學、大夏大學、知行學院、四川大學、華西大學、齊魯大學任教。教學之餘，他還主持《山西周報》、《醒獅周報》、《青年陣線》、《國論》、《新中國日報》等報刊的筆政，努力實踐自己以言論報國的志向。

常燕生勤於思考，學問淵博，筆力雄健，著作等身，學問涉及多個領域。只可惜他在年富力強的時候遇上了抗日戰爭，並且年屆五十已溘然而逝。儘管如此，他的著述還是多得驚人。在我手頭的這套多卷本的《常燕生先生遺集》中，收有他的《哲學的有機論》、《歷史哲學論叢》、《生物史觀與社會》、《社會科學通論》、《生物史觀研究》、《中華民族小史》、《西洋文化簡史》、《文藝復興小史》、《法蘭西大革命史》、《德國發達史》、《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》、《蠻人的出現》、《老生常談》、《無常與無我》和《中國思想小史》等專著。有關資料表明，未被收入《遺集》的還有《全民教育論發凡》、《社會學旨要》、《中國史鳥瞰》、《中國政治制度小史》、《德意志民族自由鬥爭史》等著述。此外，《遺集》還收有大量的「政論與時評」（兩大本）以及一本詩詞集《嶺上白雲齋詩存》。據這套書的編者黃欣周先生說，常在世時雖然筆耕不輟，在報刊上發表過大量的文章，但是由於他並不注意保存自己的作品，再加上這些文章大多寫於戰爭年代，所以「散佚既多，搜集更感困難」。事實確如此，我只是粗略地查了一下，就發現除上述致陳

獨秀的幾封信未收入《遺集》外，當年發表在《莽原》周刊的〈攬論雪恥與禦侮〉一文也被遺漏。我想這種情況大概不在少數。

常燕生雖然在學術思想上貢獻很大，但是多少年來他在大陸不是受到歪曲和誣蔑，就是幾乎被世人遺忘。這顯然與所謂非學術因素有關。常燕生逝世後，他的一位朋友在追悼會上特別提到他去世前寫的兩篇文章：〈學人與政治〉和〈無常與無我〉，認為前一篇文章表達了「學者不宜從政」的觀念，後一篇文章則流露了作者的佛教情懷。在前一個問題上，常燕生是非常清醒的。他說：「學問與事功本屬兩途，治學需要理智，事業需要意志，理智發達者，其客觀態度每多於主觀，以此治學，庶得廓然大公之效，以此治事，則不免遲疑審顧，致誤事機」，「故學人者，最不適於作政治活動者也，如其有之，則其學乃奄然媚世之偽學也」。也許是為了盡快改變這種狀況吧，他才以「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」的犧牲精神，在潛心治學的同時，不得不涉足於政治。難怪吳宓在常燕生逝世後要發出如下感歎：倘「使常君不親政治，長為教授，安居幽處，或可不遽損其天年乎」。

然而，即使是像吳宓等一大批純粹的學者那樣「不親政治，長為教授」，常燕生就能夠安享其天年嗎？這大概無庸贅言了吧，因為在這方面，我們曾經有過不堪回首的歷史和教訓。

**智效民** 山西省社科院副研究員，從事中國現代思想學術與知識份子研究，著作有《心理的單間》等。